

“浙江海洋文化知识专题”丛书

蓝色牧场

白 斌 著
张如意

话说浙江海洋渔业文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感受海洋文化
普及渔业文化
追寻渔业历史

蓝色牧场

话说浙江海洋渔业文化

白 斌 著
张如意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蓝色牧场：话说浙江海洋渔业文化 / 白斌，张如意
著.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9

ISBN 978-7-308-18360-4

I. ①蓝… II. ①白… ②张… III. ①海洋渔业—文
化—浙江 IV. ①F326.4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37362号

蓝色牧场：话说浙江海洋渔业文化

白 斌 张如意 著

策划编辑 陈丽霞

责任编辑 卢 川

责任校对 孙 鹂

封面设计 周 灵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

插 页 6

字 数 180千

版 印 次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8360-4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电话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白 斌（1984— ），男，历史学博士，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海洋经济史与世界海洋政策比较研究，代表作为《明清以来浙江海洋渔业发展与政策变迁研究》。



张如意（1996— ），女，汉族，浙江临海人，本科毕业于宁波大学，硕士就读于上海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卢 川

封面设计：周 灵



彩图1 嵎山渔场



彩图2 石塘滩涂养殖



彩图3 大黄鱼网箱养殖



彩图4 蛇蟠岛上采捕蛏子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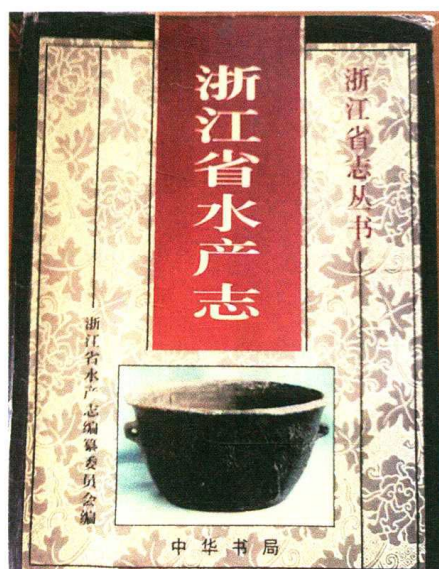
彩图5 紫菜支柱式养殖



彩图6 晒龙头鱼场景



彩图7 同治三年(1864年)渔业公所雇船出海捕鱼凭证



彩图8 《浙江省水产志》封面

序

PREFACE

呈献给各位读者的这套“浙江海洋文化知识专题”丛书，是由浙江省重点文化创新团队“海洋文化研究创新团队”完成的。每本书的作者，都根据自己扎实的专业知识，以通俗易懂的文笔，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悠久而丰富的浙江海洋文化。由于中外学者对于海洋文化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因此，有必要先对海洋文化的概念略作界定。

我们认为，海洋文化就是指人类在利用海洋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所有财富。海洋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物质层次，指的是各种有形的产品，例如船舶、渔具、码头、海塘、烽火台、海神庙等等。第二是制度层次，指的是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例如船主与雇工之间的契约、各种航海规则、中外海洋法规，甚至海盗集团内部的等级制度，等等。第三是精神层次，指的是文学、绘画、音乐、造型艺术、宗教信仰等等。其中最基础的是物质层次的海洋文化，最上层的是精神层次的海洋文化，居于中间的则是制度层次的海洋文化。这三个层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立体的、可分析的海洋文化。而这套丛书则对三个层次的浙江海洋文化都进行了介绍和探讨。也

就是说，这套丛书，是我们经过精心设计而推出的，每本书之间，既是独立的，又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中国是地球上的海洋大国，浙江则是中国的海洋大省。浙江的海岸线长度（包括大陆海岸线 and 海岛海岸线）居全国首位，浙江是中国岛屿最多的省份。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世代生活在浙江沿海的居民创造出了绚丽多彩的海洋文化。下面略举几个在全国居于前列的事实。

在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的独木舟，是中国乃至亚洲现今所知最早的木船，因此被誉为“中华第一舟”。

在河姆渡文化的几个遗址中，发现了多支木桨，这也是中国现今所知最早的木桨。

在河姆渡文化的田螺山遗址，发现了金枪鱼、鲨鱼、石斑鱼、鲸鱼等海洋鱼类的残骨，表明当时已有一定规模的近海渔业。

在象山县塔山遗址，发现了商周时期的青铜鱼钩，而且鱼钩上还带有倒刺，有学者称其为“中华第一鱼钩”。

不久前，在宁波大榭岛发现了用来烧制海盐的盐灶群，时代为4000多年前。这也是中国现今所知最早的海盐制作遗址。

在宁波东门口发现的北宋木船上，装有用半圆木做成的减摇龙骨，这比国外早了大约700年，而且，现代海洋船舶上依然可以经常见到类似的装置。

根据《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梦粱录》等文献的记载，早在宋代，浙江海船已使用指南针航海，浙江也是中国最早使用指南针进行航海的区域之一。

目前浙江出土的沉船主要有：史前独木舟，唐代龙舟（宁波和义路），北宋木船（宁波东门口），南宋木船（宁波和义路），元代沉船（慈溪潮塘江），明代木船（象山县涂茨），清代沉船（象山县小白礁）。虽然中国沿海其他省份也都发现过古代沉船，但浙江发现的古代沉船则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系列，这是比较少见的。

16世纪前半期，葡萄牙人驾舟东来，并且在宁波沿海的双屿港建立了贸易基地，这也是欧洲人在东亚建立的第一个贸易基地，此后，全球化的浪潮越来越猛烈地冲击着浙江。

16世纪中期，宁波沿海就有人随着葡萄牙人的船只漂洋过海去往西欧，从而成为最早在欧洲居住的华侨之一。

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港口城市为通商口岸，浙江因此而被推向对外开放的前沿。

1855年，宁波商人集资购得螺旋桨轮船“宝顺轮”，这也是第一艘属于中国人的轮船，标志着中国轮船时代的到来。

1885年的中法镇海保卫战，是中国近代对西方海战史上唯一取得全面胜利的战役。

在近现代，涌现出了一大批航海名家，包括董浩云（1912—1982年）、包玉刚（1918—1991年）等世界级航运企业家。

宁波舟山港是中国罕见的天然深水良港，货物吞吐量连续九年位居世界第一，2017年突破10亿吨，成为全球首个年货物吞吐量超“10亿吨”的大港。

.....

上述这些事实表明，浙江海洋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开放包容，与时俱进。今天，世界已经进入了高度发达的全球化时代，而海洋则是将世界各地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海洋文化将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浙江海洋文化也将发扬自身特点，更好地走向未来、走向世界。

龚缨晏

2018年3月26日

前言

FOREWORD

作为中国沿海省份之一，浙江与海洋的关系密不可分。早在远古时期，浙江沿海居民就已经懂得把从大海中采捡与捕捞的海产品作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自 20 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对海洋的认知愈发深刻。在海洋经济研究的热潮下，涉及海洋渔业、海洋资源和海洋交通等各领域研究逐渐深入。

海洋渔业是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当大一部分人将其作为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就浙江海洋渔业的生产结构而言，其海洋渔业捕捞在整个海洋渔业生产中仍旧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在传统渔业经济发展中，浙江先民驾驶渔船扬帆出海，凭借着勇气和冒险精神尝试从大海中收获没有产权的海产品并在沿海海产品市场上出售以换取必要的生活用品。这种生产方式不同于农业社会的种植业，即使在海洋水产养殖逐渐规模化的今天，这一方式仍改变不了，这也是本书用“蓝色牧场”来形容浙江海洋渔业的原因。

浙江的海洋渔业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时期，不过当时在简陋的生产条件下，人们只是在海滩采集和围捕鱼虾等

中小型海产品。即使当人们可以凭借造船技术的进步在沿海活动的时候，对海洋渔业资源的捕捞仍旧局限在潮间带（平均最高潮位和最低潮位间的海岸）的范围。随着风帆与造船技术的革新，在海洋经济活动的刺激下，众多商人冒险开辟了近海和远洋航线，海洋渔业的捕捞范围才逐渐从潮间带向近海发展。可以说技术进步与海洋经济本身的繁荣是浙江海洋渔业发展的基础。另一个刺激浙江海洋渔业发展的因素就是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和人口的迁徙，浙江海洋渔业消费市场开始逐步扩张。渔业消费市场的扩张则得益于海产品加工与烹饪技术的发展。种种因素的重叠，使得浙江海洋渔业的生产规模扩大，知名度逐渐上升。

历史上，唐宋史书与地方志对浙江海鲜赞美的记载层出不穷。就现有史料来分析，浙江海洋渔业的规模化生产应该不晚于唐代，因为从当时浙江每年向宫廷上贡的鲛鱼皮（即鲨鱼皮）来看，其捕杀任务并不是靠单人的力量就可以完成的。两宋时期，浙江海洋渔业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产供销体系，当时的宁波、杭州、温州及沿海的大市镇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海产品销售市场，浙江海洋渔业税收也在这一时期被纳入地方财政的范围，其中相当多一部分成为地方官学的日常经费。除常年从事海洋捕捞的渔民，在鱼汛期大量懂得海洋捕捞的农民也加入近海渔业活动，半农半渔是这一时期渔民结构的一个明显特征。尽管元代是非汉族统治时期，但其重商主义及在海洋方向的扩张是非常有利于浙江海洋渔业发展的。自元代起，中央政府开始加强对沿海捕捞活动的日常管理，海洋渔业税收在这一

时期被纳入中央财政范畴。与此同时，海洋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国家对海洋安全领域的加强管理带动了浙江海洋渔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文献记载中，元代浙江海产品捕捞种类相比宋代明显增多，这意味着渔民捕捞海域的扩展和开发海洋生物资源能力的提高。明清时期，尽管由于海防压力，政府开始重视并强化对海洋渔业生产的管制，但随着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浙江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并未出现任何放缓的迹象，反而在人口暴增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双重刺激下出现从捕捞到养殖、从近海到远洋、从个体到群体的结构性转变。除此之外，清政府对海洋渔业的态度也从原有限制逐渐向有限开放转变，传统渔民出海不仅可以从事海洋捕捞，还能搭载货物，从事近海运输以补贴家用。

自晚清以来，在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冲击下，浙江海洋渔业无论是在生产技术、市场还是经营方式上都逐步加快了转型步伐。与传统时期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浙江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明显带有政府引导与推动的痕迹。近代浙江乃至中国海防的压力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及官僚阶层寄希望于通过发展海洋渔业来抵制海上入侵并维护中国海权，这也使得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海洋渔业管理体制在不断的纠错尝试中完善并成熟起来，这一时期中央及浙江地方政府涉及海洋渔业革新的领域包括：新式机械化捕捞技术与渔轮的引进，现代化鱼市场与金融体系的建立，渔业中等教育与水产调查的展开以及渔业合作组织与护渔团体的转型。一系列的革新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并未能使得浙江沿海渔民彻底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但为区域海洋渔业经

济的全面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政治动荡、军事冲突和外交无力可以说是近代浙江海洋渔业经济发展最主要的阻力，而这些也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逐渐消失。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浙江海洋渔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使得分散的海洋渔业生产工具得以集中。以公社为主体，浙江海洋渔业生产工具革新速度大大加快。在民国时期占主体的木帆船纷纷被钢制机帆船代替，公社集体渔业经济与国有渔业公司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浙江海洋渔业的生产主体。与此同时，在浙江沿海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努力下，近海养殖业也逐渐在沿海被大规模推广开来。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技术革新与过度捕捞导致浙江海洋渔业资源衰退，但浙江渔业生产集体化不仅缓解了沿海农业生产的压力，也为区域工业化的展开积累了大量资金和外汇。改革开放后，浙江海洋渔业消费随着人们消费力的释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呈爆炸式上升趋势。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在新式加工技术和运输手段的刺激下，浙江海洋渔业消费市场已不仅仅局限于浙江沿海与周边省份，还包括内陆区域及周边各国，渔业产品也从单一的饮食消费向工业消费、保健消费、文化消费扩展。如今，浙江海洋渔业经济在浙江海洋经济总量中占有重要地位。

对浙江海洋渔业经济的介绍可以从时间和经济体系两个维度展开，本书以图文结合的形式从经济体系这一维度对浙江海洋渔业经济进行了展示。对浙江海洋渔业经济活动的展示不仅包括渔业生产、流通和消费，还包括渔业资源、组织、教育、技术等。与工业经济所不同的是，海洋渔业经济受气候环